

洞山药艾吟



徐世珩 著

注

洞山药叟吟草

徐世珩 著
龙先绪 注释

一九九八年三月

封面题字:刘耕阳

封面设计:王道常

洞山药叟吟草

徐世珩著 龙先绪注释

自费出版印行

内蒙包头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插页 字数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黔新出(97)内图资准字第 2—45 号

工本费:十九圆



作者徐世珩先生

徐世珩诗集序

龚开国

徐世珩老师的诗词著作，解放前就蜚声乡梓，享有盛名。受徐老师溉泽的后进学子如我辈，早有结为一集，便于学习，并广流传的愿望。八十年代初，陈天伟等同志积极推动促成，经搜集整理，编入了《仁怀诗征》。《仁怀诗征》印行后，稍广流传，见者交口赞誉，但毕竟并非完璧，也非专集，犹存遗憾。近年，徐老师年事既高，病笃者再，陈天伟等同志亟望趁徐老师尚在，尽可能搜集全部诗词并对联文章，结为一集，以遗后人。天伟同志自任作传，委托龙先绪同志协助徐老师搜集整理抄录，就便请徐老师指导，作简要注释。徐老师的夫人曾龙仙同志，抗日时期参加地下党，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清贫一生，无所谓积蓄，唯晚年无所负担，略有结余。她当然深知徐老师一生清苦，而酷爱书籍，所得工资，奉老养家之外，全部买书了；徐老师自费印书，自有困难，亲近的热心朋友也无有此财力者，而以此事求告于人，又所不愿，乃慨然倾其结余，以作印行之费，表示唯愿及早成书，唯愿徐老师亲见成书。诸事俱备，天伟同志命我写序。虽然徐老师视我为友，我则私心尊之为师，学生为老师的著作写序，是僭越的；我也还自知学识鄙陋，也还自知为学识高出我多多者的徐老师的著作写序，是冒昧的。但在上述的情

势下，如果我推托，那就大负师长朋辈的热情，而如果由我推托而拖延误事，那我就更是负罪了。于是天伟开口下令，我便毅然应承；于是，带着欣欣然而又惴惴然的心情，不避僭越冒昧之嫌而命笔了。

我初识徐老师，是1951年夏秋之交。那时，我参加仁怀县中枢区滥田村土改队，徐老师在同区劳动村土改队。土改队员集中在区开会，会上结识了徐老师。徐老师解放前是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师，以学问渊博，诗文工整誉满仁怀。他的许多逸闻韵事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我虽未曾亲聆教诲，却也多有所闻的。因早怀钦敬之心，初识便格外留意。看去是个清秀隽雅，态度温和，很少说话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完全不是预想的拮据危坐，轻易不开口，而开口便“之乎者也”满是经典故实的老夫子；而且同我们一样，自己背背包，往来于山坡小路之间而视若平常，并没显出自视高出于人的学者架子。这就使我觉得无须跪拜顶礼，可以日常亲近的了。那一期土改后，我们便同在中枢小学工作。徐老师上六年级语文课，我上五年级语文课。我是刚开始学教书的新教员。开初，我往往私下注视着徐老师怎么教，偷着向他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熟悉，也就时时向他请教了。我那时的感觉是：徐老师的语文根底很渊博很深厚，讲授语文，引述广博而切实，但我以为象那样来教我，倒颇合适，教小学生，未免深奥了些。徐老师待人接物，温文典雅，谈论艺文，信实有趣，而如若人们语涉斜邪，他就总是掩口

而笑，不参言了。用中枢茅台街道群众评论徐老师的话说：“他是个糍粑(慈悲)佛，一辈子不谈一句不正经的话的！”我想，这当是徐老师一生言行深印在群众中的固定了的形象吧！

我和徐老师同处共事，只有1951年下半年在中枢小学，1954年秋到1955年暑期一年在茅台小学两个短暂的时期，但从初识以后，便过从甚密，交往甚深，一有机会，便日夜长谈，总有说不尽的话，讨论不完的学问。内容主要是古今艺文学术，大至一个时代的倾向，小至具体的篇章词句；六十年代，增加了气功丹经；八十年代，又增加了易经术数。对于这些对于或正是时尚，或正不容于时势的内容，我们都倾心坦白地交谈；有些问题，还时有争论，甚至于长期争论，但决无意气之争，决不隐晦曲折。即使在言论动辄得咎，文网密如蛛网的时候，只要无人旁，也相对敞开，决无避讳；更无或者会被抓住辫子打小报告的顾虑，真可以说是趣味相投，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了。

说起艺文，徐老师常是娓娓谈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夹以典故史实，真是学理与趣味兼得，令人愿听，乐听，听而忘我忘形！我有三个子女，他们都熟知徐伯伯一来，必要日夜长谈，便都自觉地赶紧做完该做的作业家务，以便旁听。如果正在做家务事，便伸长耳朵，听到讲故事，便连忙赶来。有时是正在洗碗，没来得及擦干手立即赶来，故事已经收头了，便埋怨，人家来听，你们又不

讲了！徐老师往往微笑着给他们再讲一次。到现在，我的几个子女都成人了，他们回忆起来，还感到十分有趣，而又对谈论的许多内容当时还听不懂而十分遗憾！

我学写古体诗词以来，每有所作，或持以当面请教，或书信请求修改。常常一经指点，改动一句一词，便觉全篇生色。徐老师的作品，有许多还是初稿，我便得先读；以后修改定稿，也往往及时得读；有时在修改中，我也发表点意见，而或得采择。这样密切的交往，经常的讨论，使我在治学上少走了许多弯路，我自问许多年来，治学上不敢说日有所进吧，说年有所进是并非自诩的。每当我自以为学有所得，见面陈述之后，徐老师往往能有所补充，或有更进一步的见解。我在学问上越有进益，才越感到徐老师的广博深厚，正是因此，虽然徐老师从来谦逊，一直以朋友视我，我是一开始，便尊之为师，而且越来越衷心的尊之为师的。我们之间的讨论，从来是平等的，是交流式的，徐老师没有在讨论中指导我的意思，我也没有要在这种讨论中具体学点什么的用意。完全是兴趣相投，气味相投，爱好相投，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乐趣，而我从中所得的教益，自是多多而难能罄书的。我想，这是真正本来意义上的师兼友吧。

正是数十年密切的交接往还，经常的讨论切磋，我对徐老师的治学为人，学术创作，自觉有较深的了解。徐老师生来聪颖，幼年即能缀句成诗。青年时期，游学遵义贵阳，深受当时由文字学入手研究经学的名师的影响。

多年来，沿着乾嘉学派严谨的治学道路，孜孜矻矻，沉吟于经史子集之间，尤其深研古诗文辞，而以通贯古今，成就一代学者自律。解放初的几年间，曾沉潜于古今语法研究。后见艺文之学，不为时重，而偏处一隅，难与当代名家研讨交流，成就一代学者的愿望，难于实现，遂转向研究中医药学，而于艺文，仍继续着力。徐老师学习研究中医，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持续数十年不辍。他以积累多年的厚实广博的古文基础和研究古籍的方法，去研读中医药学的经典，自易直趋幽邃而融会贯通。徐老师曾说，初学的几年，往往读书了了然，而一经伸手摸脉，就觉得恍惚了。于是积极从事实践，同仁怀名医韩玉伦先生等切磋讨论，共同治病，同时广泛学习各种民间药方，亲自采药制剂。经数年而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兼臻善境，而声名鹊起，远近求医者络绎不绝。遵义专区名医周卓群先生每遇疑难病症，均请徐老师会诊；专区名医马文骏同志，曾多次专程向徐老师请教，因得见徐老师藏书，曾感叹说：真是书海！国内中医药古今书籍，于此全备了！徐老师广泛实践，深入研究，贯通领悟之后，曾计划写三部医学著作。其一为《医案百例》。从数百例成功的疑难医案中，挑选有代表性的百例，整理为一集，提交县委，作为证据，申请转业从医。结果被认为不安心教育工作，未获允准，而此整理成文送报的稿本未能退回而不知去向，原稿也散失了。其二为《伤寒歌诀》。计划写成一部中医经典《伤寒论》历代研究与实践的集大成式而

又便于一般医生诵读记忆之作。写了近一半,先因文化大革命干扰被迫停止,后因年事已高,精力不足,未能完稿。其三是七十年代文革中,为引导当时下乡当知青的独生女徐开渝学习医学而写的入门而又切于实用的著作,也是写了约一半,后因开渝无志于此,又未完成。徐老师现在的健康情况不佳,而又专注于气功,看来是不能再整理散失医案成书,也无精力与情绪续完未成之作,可能三者都将成为永憾了!

徐老师对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无所不读,也都有很深的研究。青年时,还曾有出家修炼的念头,虽因家庭阻止而未果,但毕其一生,除沉潜于艺文医学之外,一直不断地研究佛家经典和道家丹经,并且身体力行,坚持炼功,也就是通俗说法的练气功。青年时代,曾出现过大若金刚,小若婴儿的功景;解放后,一段时期,练气功不见容于世人,而又或居处褊窄嘈杂,或工作紧张冗繁,或政治运动挤逼,不得已一再打断,然而断而又续者再三再四。晚年广泛学习各门各派功法,但是看来是终因年老,或者是蔽于典籍,竟成识障之故吧,进展缓慢了。但是,我认为,以徐老师孱弱之身体,苦读之损耗,而能如今之高龄尚健朗者,实得益于气功不小。近两年时或有病,甚至曾经病笃称危,我也认为自会逐渐康复,还将登山临水,发为歌吟的!

许多人说,徐老师的学问,诸凡哲学、史学、语言学、中医学,以及佛家道家,易经术数,卜筮堪舆,气功丹经,

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这话近于事实。我要说明的是：徐老师的父亲徐永银老先生，确实精通堪舆，徐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略有所知，但并未认真研究，还不能说精通。所以偶有亲友以葬亲谋地事求告，而徐老师实情相告，婉言谢绝，竟传出怨言，其实是轻听传言，误以实话为谦逊，或竟把实话看作托辞的误解。

许多人说，徐老师的诗文，古奥偏僻，很难读懂。事实是，确有少数篇章，词语比较古奥生僻，这正象郑珍的《巢经巢诗钞》中，很有一些篇章古奥生僻一样，沉潜于古文字学的学者，视平常人认为古奥生僻的词语典故如日常用语，发为歌诗，信手拈来，并不觉其古奥生僻的。所以说，这是学人之作，是学人的诗歌，是因其事因其时而不同的，也因此，大部分作品，是并不古奥的。五十年代初，我读《莲山吟》，也曾有类似的感触，只是到后来，我读的书多了，才逐渐领悟到这一点。这样说，并不是古奥的就不古奥了，而是说，古奥自有其古奥的因由就是了。再说，徐老师写的是古体诗，即便是对其中大部分词语平易之作来说，那也并非白话诗文的平易，也仍然是要具有一定古诗文水平才能理解领悟的，正如欣赏音乐须有音乐的耳朵一样，欣赏古诗文，也应有相当古诗文的素养。不承认这一点，而以白话诗文的通俗易懂为标准来议论古体诗文，那当然是凿枘不入的。

如前所说，徐老师的很多作品，从初稿到定稿我都读过，有的还在修改过程中参与过讨论，但毕竟总是单

篇看待，未曾作过整体研究思考。1983年，在天伟的推动下，徐老师对存稿作了一次辑录整理，我得以系统研究。研读之后，我给徐老师写了一封万言长信，报告研读心得，夸大一点说，也就是评论吧。那是写信，没有存底，徐老师处也翻检不到了。但那封信的基本论点，我写成了三首律诗，附在信末。这三首律诗，题为《读徐老诗稿后》，倒录存了下来。诗如下：

高吟低诵风前舞，逸兴遄飞韵味浓。缀字如珠呈异彩，联篇似锦焕长虹。梨花片片飘飘下，月色朦朦漠漠空。物象描摹君最健，穷形极物夺天工。

徐陵佳句醇于醴，沉郁姜家山上诗。国事蹉跎犹有痛，家人团聚已无时。三题九首存忧愤，百代千年见伟辞。好作离骚当户读，无忘十载世如痴。

阖卷思飞天宇外，诗人形象绝寰中。神龙矫夭云环护，灵凤翱翔意混融。旷野红梅香馥馥，高山古柏郁葱葱。周黎郑莫皆颌首，异代心同兴寄同。

这三首诗，表达三层意思：

其一，徐老师的诗词，遣词炼句，特有功力。他在广阔的词汇海洋中拈选词语，精心锤炼成句，便焕发出特异的光彩；这样炼成的凝炼的诗句经他的匠心组合，便成为似锦如虹极富表现力的诗篇。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并且确当地表现物象的特征，形成象春林片片梨花飘飘而下那样自然，象秋夜朦朦的月色下漠漠空阔那样空灵的意象，达到了穷形极物，巧夺天工的高度，而音韵流利响

亮,令人感到韵味浓厚,诵读欲舞。

其二,徐老师的诗词,以工整精炼,灵秀隽永为主要特色,而《姜家山学稼有感二首》、《姜家山秋夜有感二首》、《山中秋暮感怀五首》,当时读到的这三题九首则沉郁忧愤,为我所特别推崇赞赏。据我所知,这几首诗,当年只是写在心上,而不能写在纸上的,这种诗句,在当时被监管劳动的形势下,随便一两句被抓住,都必定会带来不可设想的灾祸。1969年底我去茅台徐老师家中,第一次听徐老师口诵这几首诗,便觉得是极尽家国之痛的忧愤深广之作,以后每次诵读,都不觉泫然涕下,有时甚至禁不住伏案痛哭。这或者是我个人有遭际相同的同感之故吧!但文革中,这样的遭际,不几乎是全民共同的吗?所以我相信,徐老师写的是个人具体的感受,而表现的则是,除极少数机谋权诈而飞黄腾达者之外的绝大多数人的感情,其典型性的高度,高到几乎全民的程度。这不只是个人受冤屈的怨愤,而是个人和家国一体的忧愤!这是直面现实人生的切实而深刻的描写,是直指黑暗现象的尖锐的揭露,愤怒的抨击!在我所读过的国内名家文革期间写的古体诗词中,无有高过于此的了。这是足以用作教育后人永远记住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的传世之作。

其三,徐老师的诗词,总体上显现出一个超绝卓拔的诗人形象,有如矫夭的神龙,翱翔的灵凤,旷野的红梅,高山的古柏,而不为时人理解,不得时人重视,然而

沉潜于学术文章的先贤如周渔璜、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定是首肯赞赏的，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但在共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们的志趣和归趋是相同的。

以上三点，是1983年时的见解了。后来《仁怀诗征》印出，我得以不时翻阅，逐渐有一些新的思索。最近通读了徐老师自编的诗文稿，更有了进一层的见解。

这本诗文稿，已经是搜集了现在可能搜集到的全部诗词联对文稿了。但我读去，是明白感到还有遗漏的。比如，如前所述，徐老师是不苟言笑，尤其是大家玩笑涉及斜邪的时候，他总是掩口而笑，不置一辞的。我们年轻时，大概都有过玩笑到语涉不经的时候吧。现在年纪大了，见到子女辈在一起开点玩笑，我们又怎么好混在一起说些轻簿话呢？但许多人却据此给徐老师加个称呼，叫做“迂夫子”，这实在是连个明显的道理都不理解了。我不知道徐老师年轻时，与同辈伙伴在一起，和曾老师讲恋爱，是否也有过玩笑，但我确实知道，四十年代初，徐老师和曾老师新婚后，曾经时常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高跟鞋，手挽着手款款通过当时中枢镇狭窄的石板路大街，尽管两旁街道居民窃窃私语，惊诧地注视，他们仍傲然怡然地一次又一次缓步通过！终于使得中枢街道居民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认同这是新式人物合当有的新式行为了。这在当时偏僻的仁怀县城，应该算是反封建的勇士行径吧，哪有一点迂呢？我在徐老师面前，算

是放肆一点，曾以此闻当面询问过是否事实？徐老师笑而不答；曾老师则说：“那几年，是耍了几年好的”！一个是默认，一个是承认了。那些年，徐老师曾写了不少婚恋诗词，那都是写给曾老师的，有的还曾经在当时的青年中传抄过。曾老师是地下党，辗转奔波隐匿，无所存留了，当时曾传抄的，也追寻导不到了；徐老师记忆力很强，但年代久远，只记得些断句，不成全章了。那些诗，不仅是徐老师婚恋题材的作品，而且，其间有着那一时代革命青年的地下党员曾龙仙老师思想生活的反映，没有存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现在集中1942年《秋夜有怀》一首，当是写给因仁怀地下党遭破坏而避难去重庆的曾老师的。从这一首，可以想见很多了。这类作品如果全部或部分存留入集，所谓“迂夫子”的议论，自然会消失，无须我来作辩解了！解放前的诗词稿，散失的又岂止这一类呢？至于文稿，则散失尤多。现在读集中文章，联想平日闲谈中曾提到过，徐老师曾以手稿出示过，甚至徐老师背诵过一些段落，我还依稀有些印象的，都没有见于集中。向徐老师询问，说是文革中藏匿，又几次搬家，现在翻检不到了，真是可惜！但毕竟这是一本就目前情况来说，搜集完备的诗文集了。真要赶快编成印出才好，不然，稍事拖延，再有散失，那就会成为，至少说是，仁怀市文化史、文学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了！

我有幸先期读到这一部完备的诗文集，一再地唤起我数十年来跟从徐老师谈诗论文的记忆，使得我获得了

进一层的认识,觉得1983年时的见解,未免失之于浅,失之于偏,失之于空了。

第一,徐老师在少年时代,私塾童蒙就学时期,经受过严格的声律,对课的训练;在儒家传统经典的浸泡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又认真地研究文字训诂之学,浸润于文史典籍之中,涵泳于古诗文辞之内,扩而至道家、佛家、医学、术数,以及笔记野史,丹经秘籍,杂览旁收,遂成就其渊深博雅,卓绝宏深的学识。青年时期,即开始艰苦的创作实践。在诵读古人名篇名作中,研究古人的创作经验,再与个人的艰苦创作实践相结合,而独得诗词创作的要妙。徐老师学识渊博,掌握词汇,富如大海;对事物感受,独具敏感。因此,独能抓住物象的特征,驱遣恰当的词汇,铸炼特出的语句,表现独立的感受,造就卓立的意象,早年“倚楼闲看飞鸦背,驮得斜阳过小桥”,便已显出独具敏感的新颖意象了。而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峨嵋纪行十首》,每首都铸炼出凝炼工整的诗句,突现出景物的特征;十首合起来共同表现出与景物混融一体的独立、超绝的学人、诗人的形象。

我说徐老师诗词独具对事物的敏感,善于驱遣词语铸造工整凝炼的诗句,造就独立卓特的意象的特点,是从我也参与游历的几首游历诗中体会出来的。

例如:《最高楼》。1961年秋,我在贵阳师院中文系毕业待分配时,陪同徐老师、韦老师游邻近的东山。其时,东山寺庙重新修葺,寺僧时事打扫,山林庙宇整洁幽

静。我们经扶风山脚至东山，循山路盘旋而上，直登绝顶，纵览全城，议论时事，抒发感怀，确有天下已任的豪雄之气。词的上阙：“攀苔磴，飞步蹶奇峰，傲倚晴空。层楼僧扫浮云净，高林蝉唱夕阳红。看天边，山卷浪，鹤盘风。”确实既写实景实情，而又非实景实情，有夸张，有交错，实而虚，虚而实，真是源于实景实情，而又高于实景实情！好个“看天边山卷浪，鹤盘风”！确写实景，而又突现了豪雄气概，真是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从景达情的妙句！一“卷”一“盘”，多有气势啊！这句话炼的真好！从东山下来，转至扶风山麓的阳明书院，又称阳明祠。在祠内瞻望，在庭院散步，追想王阳明于此地讲学情景，历数贵州历代文化名人事迹，兴会无穷！下阙：“喜龚胜、韦贤偕把手，邀子尹、阳明来作友，夸盛会，乐融融！”是在实事实情上的虚构，古今混同，造成虚境，实而更虚了。“烟霞当纸铺吟案，银潢为酒酌瑶钟。对江山，诗任写，兴无穷！”记得登东山是午前，在东山上吃了餐菜豆花饭。到阳明书院，已经是下午好久了。书院庭前有一排很高的树，果真是前阙写的“高林蝉唱夕阳红”了。游历中不时谈诗，却没有作诗；在东山吃饭时，也似乎并未喝酒。当时是有诗可作而未作，无酒可喝而想喝的。诗句写的情有实据而景却虚而又虚了。一同游两处名胜，写在诗里，却把两处交错在一起，混融为一体。诗句凝炼工整，情景交融，写出了当时豪情逸兴，真正是贴切而又虚灵。我以为于此可以体悟到从实情实景出发，联词炼句，布局谋